

1. 八九民運是一場民間自發，爭取國家民主自由和抗議中共專制貪腐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是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最後中共以殘忍暴力的血腥鎮壓而結束，造成可恥的歷史悲劇。
2. 在毛澤東時代的獨裁專制下，中國人民受盡了欺騙和折騰。在七九年改革開放政策下，人民都開始體驗到言論和結社自由的重要和專制獨裁的弊端。但在推動社會開放和政治改革方面卻完全缺乏經驗，社會更沒有出現較成熟的民間政治團體。
縱使中共當時的領導層有較為開放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但中共的政體基本上還是一黨專政，更重要就是權力中心還是牢牢掌握在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革命」手中。一些熱血青年學生和一大羣為學生感動的市民，參予發展成天安門廣場政治，已被視為挑戰和威脅中共專政權威和合法性的暴亂。最可悲的就是，面對著兇殘和狡猾的專政者，八九民運的參予者顯得缺乏經驗和組織行動的策略。
3. 任何獨裁管治者，除了依賴壟斷武力之外，更慣於控制輿論，封鎖資訊以至有組織地製造謊言，醜化其反對者和異議者，美化自己的過去，粉飾其失誤以至罪疚。六四屠殺者製造歷史謊言，把八九民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中共要使人民無知、愚昧和恐懼而繼續其獨裁統治。

香港的角色

4. 在八九月五月期間，數百萬香港市民在電視機螢光幕上，每天觀察著北京學運的發展，深受學生的真誠所感動。五月十九日，中共頒佈在北京實施戒嚴後，香港隨即出現了數次百萬市民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民主運動。香港支聯會亦由香港市民自發組織成立。五月中旬後更陸續有學生和市民前往北京，留守天安門廣場，支援民運。
5. 在六四凌晨，戒嚴部隊向和平聚集於北京街道的羣眾開槍，造成多人的傷亡。當時在場的香港的學生和記者目睹暴行的發生，感到憤怒和震驚。但身邊的羣眾卻苦苦哀求：「你們快撤退，我們在你們後面阻住；你們要回去，把真相告知全世界，我們政府如何殘暴地對待自己的人民！」當年曾親歷其境的學生和記者，就帶著傷痛回到香港，公開說出真相，紀錄和編撰了重要的口述歷史。整個香港羣

眾的起動和投入參予，雖然只是聲援的角色，但卻是刻骨銘心的！

6. 作為支聯會的發起之一及作為當年的參予者和組織者，我簡單把香港在八九年的重大活動列出如下：

- 4 月底至 5 月中 — 主要是學生遊行和靜坐
- 5 月 20 日 — 5 萬市民在 8 號颱風高掛下遊行至新華社抗議戒嚴
- 5 月 21 日、28 和 6 月 4 日 — 三次超過一百萬市民上街遊行抗議日
- 5 月 27 日 — 香港數百歌星在跑馬地進行 1 2 小時演唱為支持北京學運籌得 2 千多萬。支聯會亦宣佈成立
- 6 月後 — 協助逾百逃離大陸的民運人士在港尋求政治庇護和日後移居外國
- 9 月 — 「六四」死難者百日祭，二十萬市民出席
- 1990 年 — 至今三十年，每年六四都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在維園參予燭光悼念集會此外，每年均有遊行、長跑、放風箏、清明獻花、街頭簽心意咭〔寄至獄中民運人士〕以至到中聯辦抗議的行動。
 - 香港亦在分別多間大學豎立了國殤之柱和劉曉波銅像〔香港大學〕以及民主女神像〔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以紀念八九民運；在三十年來香港市民經常示威抗議，要求釋放被打壓和囚禁的民運人士，尤其包括天安門母親、劉曉波以及因悼念六四而被囚的人士如「八酒六四」案的四君子和掃墓的陳雲飛等，抗議被自殺的李旺陽等
- 2013 - 2015 年 — 支聯會開設了第一間六四紀念館，但因法律訴訟而關閉
- 今年 4 月 26 日 — 六四紀念館在一個商業中廈的單位狂不斷被滋擾的環境下成功重開，並在營運中

從以上的活動中可見，自六四屠殺後香港的角色已漸由一個內地民運的支援者而轉至有主體性的一個本土運動。

7. 今年香港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的主要口號是「人民不會忘記」。對香港較年長的人來說，這是如實的寫照。我亦深信內地參予和經歷六四的人民，尤其是北京的市民以至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絕不會遺忘「八九民運、六四屠殺」這件歷史大事。其實香港在每年悼念六四時的吶喊和歌聲，亦代表了在內地被沉默了的人民的心聲。香港是在中國管治下唯一享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香港人保存和維護的歷史記憶，便是整個民族的歷史記憶。筆者更深信內地得到自由的一天，北京對悼念六四的羣眾大會一定比香港的規範更大得多！
8. 長遠來說，中國內地社會正面對著日一個「記憶和遺忘」的抗爭。但獨裁者卻絕不會忘記；他們從歷史中學習，其動機和目的是要避免政權再受到如此重大的挑戰和沖擊。六四後，鄧小平總結經驗說：「要鎮壓一切動亂於萌芽狀態」。獨裁者手中沾滿被屠殺人民的鮮血，一方面加強政治社會和思想操控，另一方面是要使人民恐懼從而忘記。中共要使經歷六四的一代不想回憶，而後六四的新生代則不承傳上一代的歷史記憶，亦沒有機會認識八九民運的歷史事實。
9. 八九民運的衝擊顯示了當時中共意識形的衰敗和統一戰線的崩潰，亦使中共在六四後更要加強政治社會文化和思想控制，和動用黨國機器，迅速、強硬和殘暴鎮壓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大陸，中共在學校和社會教育中，把「八九民運、六四屠殺」劃成禁區，製造空白，企圖以時光洗掉歷史的記憶。政府更編造虛假的歷史，瞞騙人民。
10. 「六四的記憶」維護著歷史的真相。不知道歷史的真相，人們便無法辨別是非真假。沒有或輕視「是非真假」觀念的社會會道德敗壞，國家更會背向文明，走向衰落，其人民更只會活在野蠻和自私惡鬥的黑暗國度之中！所以維護歷史記憶和真相，是我們在香港享有自由的人應有的公民責任；如果閉眼過去，我們將看不到將來！

公義

11. 我們的社會責任包括：**a)** 要基於真誠去保存歷史記憶，並要不斷尋找和重構歷史的全面真相；**b)** 要基於事實、明辨是非對錯，然後為被鎮壓和屠殺的受害者恢復尊嚴和公義；亦要向加害者追究法律責任；**c)** 要為後代做好歷史教育，確保能汲取歷史教訓，使歷史悲劇不會重演。

12. 在重構歷史的真相方面，須首先爭取開放全部政府和醫院的檔案供大眾查閱和搜尋。此外，應設立有公費支持，享有法律地位和獨立於政府的調查委員會，以公開或閉門的方式搜集可信的證供和口述歷史以存檔。作供的證人不只限於暴行受害者、倖存者或其家屬，暴行的目擊者和見證者如醫療人員、記者等，以至加害者如政府官員、軍人、情報人員等的供詞亦同樣重要。調查委員會亦可傳召任何不自願但可提供事實資料和證供的人作供〔但一般不可以這些傳召得來的證供作法律起訴之作，除非是作不實證供〕。這個建議的具體運作模式和經驗可參考南非共和國在結束白人的種族隔離統治和開展民主政治時所設立的「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成功經驗。其好處不單在於能全面重構真相，亦能使加害者透過坦白作供而求取被害者的諒解和寬恕。

其實在六四後，香港在這方面已即時從內地返回的學生和記者做了百多份見證誓詞存案。支聯會亦搜集了八九年五六月間在港的報章報導和評論文章，政治廣告和宣言等，編印了共四大冊的八九歷史資料匯編。

13. 在承擔法律責任方面，策劃，決定和執行暴行的首腦和核心領導，當然須負上法律包括刑事的責任。就當年南京大屠殺，以至韓國光州事件，日本的指揮將領以至南韓的總統均被起訴和判刑。其他類似的例子亦不少。至於在受上級命令下執行的較低職級的軍人或政府人員，除非有特別情況，則一般可在坦白承認和道歉後，獲得較輕的懲罰，甚至特赦。六四屠殺是中共以國家機器執行軍令而發生，在法律和事實上是屬於國家暴力行為，故縱使中共喪失了統治地位，日後執政的國家和政府亦須負上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故政府須向受害者倖存者及家屬作出官式的道歉及合理的賠償。在歷史上，民主政府因前政府〔獨裁或已民主化的〕的錯誤，而向人民道歉和賠償，有以下的一些著名的例子：

- (a) 民主轉型後的南韓和台灣政府亦分別就前獨裁政府在「光州事件和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暴行作道歉和賠償；
- (b) 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向二戰時被非法違憲隔離扣拘禁的美籍和加籍日裔公民作道歉賠償；
- (c) 加拿大政府上世紀初被徵收「人頭稅」的華裔居民／公民的家

屬就此種族歧視政策作道歉賠償；

- (d) 澳洲政府向當年為進行融合教育而強行擄走的澳洲一些原居民的年幼子女及其家屬的不人道和種族歧視行為道歉和賠償。

當然類似的例子亦不限上列的例子。加害者包括政府和個人的道歉和賠償，對受害者來說，恢復公義和個人尊嚴而言國家道歉是最具意義的；

14. 在歷史教育方面，政府和民間皆有責任編撰寫公正和有公信力的歷史教科書和設立紀念館，使後代能汲取歷史和教訓，不會重蹈覆轍。縱使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至其學者會對歷史發生的起因後果會有不同的分析和評價，但對歷史的基本史實必須確認和尊重，絕不能否認，淡化和歪曲。戰後日本右翼政府對二戰侵華時所犯下的重大戰爭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殺、慰安婦、七三一、強役勞工等的事實所採取的否認逃避和扭曲的態度，正是文明社會所卑視和不能接受的。

參予者反思的責任

15. 現實上，期待專制獨裁的政府未走向民主化轉型之前，對自己的暴力行為作公義的處理，是頗不切實際之想。任何政府只建議向其暴力受害者行為作出金錢的賠償，而不坦白承認施暴罪行的事實，是虛偽和逃避責任。這樣的賠償亦是不公義和不道德的。
16. 「六四屠殺」和其後的長期政治鎮壓無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以至公民社會的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打擊。領導八九民運的學生，知識份子以至民眾，都是來自民間和自發參予的。他們缺乏充足的組織能力以和運動的經驗和策略。當運動發展成為「廣場政治」時都有一種常態：就是在缺乏組織和策略下，羣眾只傾向接受激進的領導，而不願接受其他策略的考慮。故在推向羣眾和專政者近乎「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前者往往若不成功便成仁，而在被鎮壓之餘，更可能導致民主運動的倒退和民間社會的萎縮！
17. 故未來參予民間非暴力抗鬥的運動和活躍份子，有責任總結「八九民運」的抗爭經驗和教訓。這並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有共識的議題。但參予和支持民運的人士應該以坦誠、包容和有遠見地去追尋未來抗爭形式和策略的各種可能下的轉變，這是應有的責任。2014年香港為爭取「雙普選」而爆發了持續 79 天的「佔領運動」。這運動未

有引發暴力衝突和血腥鎮壓。最後佔領區的清場以至組織檢控入獄都是這次「公民抗命」預計的結果。但我們不少參予者都認為日後的非暴力抗爭和廣場式羣眾運動，不但應更有組織和領導，更要有談判的策略和決策機制。而且，在策劃行動時，除了檢視是否符合行動者的基本信念和原則外，更要評估每次行動的效益和代價：包括在失敗時，不同參予角色的人所可能承受的後果，從而作出既理性務實亦有原則的決定。

簡單來說：參予者既要有堅定信念和原則，亦要有責任感。這是從政者應有的政治道德。

18. 近年來，香港年青一輩尤其是九十後或千禧後的青少年開始質疑自己的國籍和民族的身份認同。不少香港出生的青年，一方面質疑自己的中國人或華人的身份，有些更認定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另一方面，他們質疑支聯會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口號綱領，並認為他們沒有道義責任為中國建設民主中國，故不願出席悼念六四的活動。支聯會近年要盡力提倡「悼念六四」的精神是人文和人道精神，是超越民族和國界的，是每個國際公民應有的道德責任。

希望

19. 百多年前，中國在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下掙扎求存，歷盡滄桑。四九年中共以革命手段成功建政，但卻以七十年大一統的獨裁專制，帶來了人民極大的痛苦。要達到國家能以民為主，社會可以長治久安的理想，路途還相當遙遠。
20. 百多年來，中國人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包括：社會趨向開放文明，人民享有尊嚴幸福，政府體制和管治能實現普世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憲政等觀念和原則。這些價值觀並非來自或只適用於西方，而是國際社會在總結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而總結得來的，故亦稱「普世價值」。1998年中國政府在江澤民時代簽署了「政治及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就是確認上述的原則和價值。但其後至今，中國一直拒絕把公約提交人大通過是倡議民主自由等的普世價值，確認成為對中國有約束力的公約。2008年，劉曉波和300位知識分子共同頒佈的08憲章。其實是延續「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的民主理想和抗爭精神。
21. 自六四鎮壓以來，中國一方面加強一黨專政下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另一方面開放經濟和縱容官商這極權政治格局下造成了所產生的「共產黨貴資本主義」。到習近平新時中共更鼓吹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和承續專政。中共在黨國體制下不擇手段地利用黨組織，新科技和壟斷的暴力，來全面滲透和操控社會，以至家庭和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但民間對抗極權的維權運動，還是以不同形式進行，此起彼伏，從未平息，成為現代的抗爭模式。

22. 中共極權必然走向終結，這只是時間和路徑的問題，而兩個問題是有密切的關係。在歷史上，極權的崩潰可能在瞬息間發生，但隨著的變化是難以預測的，而民主的政權並不一定順應產生。另一方面，專制政權可能經歷不同政治民主化的轉型，其路徑亦可以是反覆和曲折的，而完成轉型的時間亦可能頗長，其間社會和人民亦會在持續的矛盾衝突中付出不少代價。
23. 我們難以期待權力核心會出現英明開放的領袖，作出從頂層開始，由上而下的民主憲政改革。從來專政者在沒有面對重大壓力下，是絕少會自發地改革和開放政權力。我們應寄託民間社會中進步和正義的力量，不斷推動民眾的覺醒和孕育民主自由的社會條件，包括建設有活力的公民社會，以推動或互動性促進上層的改革。這包括要建設文明、開放、進步的民主人權意識、人文關懷和人道精神以及社會和個人誠信和互信。這都是在「國際人權宣言」和「零八憲章」所彰現普世價值觀。公民社會的孕育成長和普世價值的啟蒙，是為國家民族走向真正的民主、憲政和現代文明奠定基礎和鋪下必經要的路徑。
24. 推動和催化中國民主發展的民間力量：
 - (a) 處於中國大陸的民間改革力量正處於文化後最惡劣的環境甚至要面對習近平新時代的另類文革的折騰。2014年，習近平定下的新黑五類為打擊對象：維權律師、政治異見人士、地下教會、網上異見領袖和弱勢羣體 – 正反映了這五個群體在民間的影響力。他們不少活躍的核心份子受盡打擊下作出犧牲〔如劉曉波、高智晟、王全璋、秦永敏等〕。他們的影響力使中共感到極度的恐懼，亦對民間的知識界和活躍份子產生極大的影響。
 - (b) 台灣是中國大陸之外一個被視為以華人社會組成的一個最大的政治實體。台灣憲制地方的爭論，不是本文的討論範疇；但台灣民主的成功實踐經驗彰顯了海峽兩岸多年來在和平競賽之中、台灣的民主管治遠比大陸的一黨專政優勝。台灣的民主既給社會帶來長期穩定。人民亦享得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台灣成功轉型在政治實踐和論述上，無疑向「中國模式」提出了最

有力的挑戰。

- (c) 香港社會一方面受到中共「銳權力」的操控，但香港的民主運動亦向中共專制權威直接挑戰。香港的自由空間雖存在於一個既微妙而脆弱的環境之中，卻扮演著百多年來一個持續不變的歷史角色 – 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政治上鼓勵、催化和促進大陸專制政權作和平演變的「顛覆基地」。香港支聯會立根本地，但其宗旨則包括推動「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香港亦有不少關注中國人權組織的辦事處，如國際特赦協會、中國人權、人權觀察等。香港爭取本地民主化的運動，亦被視為全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故有重大的象徵意義。

香港現仍享有較高度的自由和有限度的民主參予。大陸和香港間雖然設有邊界和傳訊上的屏障，但「香港模式」以至香港今日的活躍的公民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大陸日後的演變和轉型提供了一個「過度模式」的參考。

- (d) 自八九民運失敗後不少知名民運人士包括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為避過政治鎮壓和而離開大陸暫居外地，形成了國際社會和海外支中國民主的一股力量。多位民運領袖多年來從事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並希望為國家的民主尋找出路。在國際社會上，民運人士積極地扮演遊說者的角色，提高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的關注。海外中國民運力量，結合國際公民社會和人權組織，不斷在西方國家和聯合國的公約組織內發揮影響，期望能對中國的違反人權的行為，產生監察和制衡作用。

25 為何對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仍有一定的希望，因為我們深信：

- (a) 民主自由的價值現代表人類文明史發展的方向和潮流；
- (b) 在思想論述和實踐經驗上，中共推行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制已造成災難性的失敗，並受有識之士所背棄；
- (c) 事實上，不少內地的權貴階級已安排下一代移民和財富轉移民主國家包括，美、加、英、歐洲、澳、紐等。這是他們對政權的未來的希望作出最誠實的評價；
- (d) 香港不容易為中共全面取締而變為另一內地城市，因為香港多

年來所建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與其不可分割的法治制度，是實行政治專制和資訊封鎖的大陸所不能取代的。中共在面對今天的國際新冷戰格局下，更需要維持香港的自由現狀，使香港能在經濟和金融功能上發揮補充內地不足之作用。

(e) 國際自由社會和民主國家會繼續支持香港人維護既有的自由、法治和爭取民主，亦期望香港的公民社會能對內地的未來產生思想、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影響!

26. 在爭取中國〔包括香港〕民主的抗爭運動，香港多年來至現在是站在最前線。但香港人民不會感到孤獨。我們與內地的民主和維權鬥士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命運共同體，故在極困難之際，亦有內地的朋友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我們的民主運動更經常得到海外公民社會，以及民主政府和政治家的支持。民間這股不可抗拒的正義力量和民主潮流，承繼著五四運動和平反八九民運的精神動力，一定把中共的專政推向終結。

2019年5月16日